

“新双高”视域下产教融合载体建设的现实困境、 模式创新与运行机制

姚跃跃,顾洲一,季雯雯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信息技术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新双高”建设将“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确立为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产教融合载体建设由此成为职业教育改革实践的关键议题。当前,尽管产教融合载体建设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主体协同不深、资源配置不优、服务能级不高、运行机制不畅等现实困境。为此,本文立足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诉求,系统分析产教融合载体建设中的主要瓶颈,基于平台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创新性提出“1+5+2+N”产教融合合作模式,构建“共同体统领、产业学院承载、实践中心赋能、企业网络拓展”的多层次协同载体体系,并从治理结构、平台运营与资源保障三个维度,设计“五方联动”组织运行机制。本研究认为,产教融合载体具有多主体协同组织的特征,其建设应坚持系统思维、协同治理与整体推进,促进职业教育从项目化合作走向机制化融合,由单一育人功能转向人才培养、技术服务与社会支持并重的综合功能提升,进而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衔接。

[关键词]“新双高”;产教融合载体;现实困境;模式创新;运行机制

[作者简介]姚跃跃(1995—),女,浙江宁波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信息技术学院助教,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教育传播。顾洲一(1991—),男,浙江湖州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信息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经济社会统计、职业教育。季雯雯(1990—),女,浙江台州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信息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职业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Y202557477);产教融合项目“全国人工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果。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307024>

[中图分类号] G710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

引言

随着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化,“新双高”建设已成为引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2024年是“双高计划”第一个五年支持周期的收官之年,随后2025年,国家正式启动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相较于以往侧重规模扩张和办学条件改善的发展逻辑,“新双高”更加突出办学能力提升、质量内涵生成以及类型特征彰显,其中“产教融合高质量”被置于极为重要的位置。这表明,职业教育的发展重点正在由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提升,由单一教育供给转向与产业体系、创新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的深度联动。

作为职业教育类型属性的本质体现,产教融合

是增强人才培养适配性、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核心路径。当前,职业教育要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并非在于是否建立了合作关系,而在于是否形成了制度化、稳定化、协同化的产教融合载体。换言之,产教融合的成效,并非取决于合作项目的数量,而在于是否形成清晰的组织依托、稳定的资源支撑、持续的运行机制与可复制的制度安排。作为连接教育系统与产业系统的重要中介,产教融合载体承担着协同育人、协同创新、协同服务等多重功能,其建设水平直接关系职业教育改革的实际成效。

近年来,学界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了广泛探索。围绕产教融合共同体、现代产业学院、市域产教联合体、实习实训基地等方面,产教融合的组织

形式不断丰富,实践路径持续拓展。然而,从现实运行效果看,不少载体仍然存在合作层次不深、资源整合不足、运行效率偏低、长效机制缺失等问题,部分合作仍停留在协议签订、项目拼接和资源叠加层面,尚未真正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耦合。尤其在“新双高”建设背景下,传统意义上的松散型、项目型、阶段性的产教合作,已难以满足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如何构建结构清晰、功能复合、机制健全的产教融合载体,已成为目前迫切需要回应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基于上述困境,本文在“新双高”视域下,依据平台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创新性提出“1+5+2+N”产教融合合作模式,并探索设计“五方联动”组织运行机制,以期为新阶段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载体建设,提供具有一定解释力和推广性的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新双高”视域下产教融合载体建设理论分析框架

一、“新双高”视域下产教融合载体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主体协同不深:多元协同治理格局尚未真正形成

产教融合本质上是政府、院校、行业、企业、园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过程。由于“核心—外围”结构失衡,不同主体在目标导向、制度逻辑、利益诉求与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使得产教融合在组织协调与制度整合方面,天然面临较高难度。当前实践中,尽管上述多元主体普遍“在场”,但“深度协同”仍显不足,协同治理的制度效能尚未充分释放。

其一,合作动力差异明显,企业多以短期利益为导向。相较于职业院校较强的合作主动性,部分企业参与深度合作的意愿仍然有限。企业更多出

于人才储备、政策响应或社会形象塑造等短期利益考量,而很少从产业技术研发、工艺优化、岗位重构与产品迭代等关键环节出发,导致多数合作仅停留于实习安排、订单培养、短期培训等层面,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享、责任共担与价值共创关系。

其二,协同治理结构实质化程度不高。虽然部分产教融合载体已建立理事会、共建委员会等治理架构,但在实际运行中,仍不同程度存在议事规则不健全、权责边界不清晰、企业话语权不足、决策与执行脱节等问题。行业与企业在专业调整、课程开发、实践教学组织、人才培养标准制定和质量评价等关键环节的参与程度偏低,导致协同治理往往停留于形式,难以形成真正有效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从深层次看,主体协同不深的原因,集中体现在产教融合载体缺乏稳定制度安排和利益联结机制。多元主体之间尚未形成牢固的共同目标与共同责任,这使得产教融合难以由“协作关系”发展为“治理共同体”。

(二)资源配置不优:跨主体资源整合与共享机制仍显薄弱

产教融合载体的有效运转,主要取决于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深度整合,包括实现人才、设备、课程、技术、数据、项目与场景等关键要素的高效流动与合理配置。然而,由于平台模块之间缺乏有效协同,当前不少载体在资源配置上仍存在“重平台建设、轻内容生成”“重物理投入、轻机制协同”的倾向,资源协同配置效率不高。

其一,硬件投入与软件支撑之间,存在明显错位。部分载体在实训场所、设施设备和空间建设方面投入较大,但缺乏与之配套的课程体系、教学项目、师资结构、评价标准和组织方式,导致部分设备资源闲置、实践教学流于形式,难以将硬件优势有效转化为育人优势和服务优势。这种“重建设、轻内涵”的倾向,从根本上,削弱了产教融合载体的持续运行能力。

其二,跨主体的资源共享机制尚未建立。职业院校拥有教学组织、科研基础和师资力量,企业掌握真实生产场景、技术工艺和市场需求信息,园区则具备空间资源、产业集聚和政策支持优势。由于缺乏常态化、制度化和利益联结型的资源共享机制,这些资源往往分布在不同的制度边界和组织体系之内,难以形成协同增效,导致资源“各自沉淀”、功能“彼此分离”,制约产教融合载体的综合发展

效益。

总体而言,资源配置不优的深层原因在于资源整合逻辑不清、共享制度不健全以及协同平台承载能力不足。如果载体不能从“资源堆叠”转向“资源重组”,产教融合的建设质量难以得到真正有效提升。

(三)服务能级不高:价值创造功能尚未充分显现

“新双高”建设视域下,职业教育不仅要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而且要增强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区域发展、促进产业升级的能力。这意味着,产教融合载体的功能不应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教学辅助与学生实训,而更应成为技术技能积累、协同创新、成果转化与社会服务的重要平台。从现实表现看,当前不少载体仍以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功能为主,其价值创造能力尚未充分显现。

其一,服务内容仍以基础合作为主。当前多数产教融合实践集中于实习实训、订单培养、课程共建与就业对接等方面,在技术改进、工艺优化、标准开发、产品中试、横向研发等高层次服务领域涉入不深。这反映了部分职业院校在产教融合中仍主要扮演“人才供给者”角色,尚未成长为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服务参与者”和“协同创新合作者”。

其二,服务能力与产业升级需求之间,存在明显张力。随着数字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制造的快速发展,产业组织方式、岗位结构和人才规格都在持续演变。然而,部分职业院校在专业调整、课程更新、教师能力提升和教学资源转化等方面,响应迟滞,致使载体建设在对接新技术、新职业和新场景时,呈现一定市场滞后性。这种服务能力与产业升级之间的不匹配,直接制约了职业教育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

从更高层面看,服务能级不高,则意味着产教融合载体尚未完成从“合作平台”向“价值平台”的转变。若不能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与社会支持中形成实质性贡献,载体建设的战略意义将受到严重制约。

(四)运行机制不畅:长效发展基础仍需进一步夯实

产教融合载体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取决于初期建设的投入,更取决于是否能够形成稳定、清晰、有效的长期运行机制。当前,不少载体在建设阶段过于依赖项目推动和政策驱动,内生动力、利益联结、风险共担和评价激励机制仍显不足,制约了载体效

能的持续释放。

其一,自我发展能力偏弱。部分产教融合载体在运行中,较大程度依赖财政资金、专项经费或阶段性项目支持,尚未形成以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社会培训和技能评价等为支撑的稳定收益来源。一旦平台在政策支持上减弱,或者项目周期性结束,容易出现后续投入不足、功能弱化和运行中断等问题。

其二,制度供给仍然不足。在产权界定、收益分配、资产管理、人员流动、风险防控、退出机制等关键问题上,现有制度规范仍不够完善。特别是在涉及共建共管、混合投入、成果共享和协同研发时,各方常因权责不明、风险不清和收益预期不稳定而降低参与意愿,进而影响深层合作的推进。

其三,评价与激励机制不够健全。当前对产教融合载体成效的评价,仍较多关注平台数量、合作协议数量和项目数量等显性指标,缺少对于技术服务能力、成果转化绩效、育人质量提升和产业贡献程度等的实质性指标的考察。同时,教师、企业导师和管理团队参与产教融合的激励机制也不够完善,难以形成持续投入的制度牵引。

总体而言,主体协同、资源配置、服务能级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问题,共同构成了产教融合载体建设中的系统性制约因素。为推动产教融合从松散型合作走向深度耦合,需在组织模式与制度机制两个层面协同推进,探索更具系统性、开放性与可持续性的发展路径。

二、“1+5+2+N”产教融合合作模式的构建逻辑

面向“新双高”建设所提出的高质量产教融合要求,传统的点状合作、项目合作和松散合作,已难以适应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产教融合载体建设需突破主体单一、层次分散及功能碎片化的既有局限,转向结构清晰、分工合理、功能复合且动态开放的协同平台体系。

平台生态系统理论则为产教融合载体的组织逻辑提供了重要分析框架。产教融合载体,本质上是一种教育-产业复合平台系统: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作为平台核心,承担标准制定与资源聚合功能;现代产业学院、实践中心与企业网络作为互补模块,分别承担专业承载、技术赋能与生态拓展功能;而“五方联动”机制,则构成模块间的接口规则。基于此,本文提出“1+5+2+N”产教融合合作模式,以期构建“共同体统领、产业学院承载、实践中心赋能、企业网络拓展”的多层次协同架构。

(一)“1”: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强化战略统领

“1”即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作为统领性平台。与传统点对点的校企合作不同,共同体强调跨主体、跨区域、跨组织的资源集聚与制度协同,其作用不仅是扩大合作范围,更在于提升合作层级和治理能力。

一方面,共同体能够实现高层次资源整合。通过吸纳龙头企业、本科院校、职业院校、行业组织等主体,共同体可以集聚共享课程资源、技术标准、实训资源、专家资源和项目资源,为产教融合载体建设提供更加系统化的支撑。另一方面,共同体具有显著的标准引领功能。根据行业技术演进、岗位能力升级和人才成长规律,共同体可以联合研制人才培养标准、课程标准、实践教学标准和评价标准,从源头上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匹配程度。

更为重要的是,共同体还能够在协同创新和社会服务中发挥平台作用,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耦合,推动产教融合由单一育人逻辑向多元价值创造逻辑转变。因此,共同体是产教融合载体体系中的战略中枢。

(二)“5”:以现代产业学院构建立体化专业承载体系

“5”强调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和岗位能力结构,布局若干方向明确、分工合理、协同支撑的现代产业学院群。这里的重点并不在于数量本身,而在于通过多个产业学院的协同布局,构建立体化专业承载体系,使专业群能够真正实现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

从功能定位来看,不同产业学院可以分别面向基础支撑、关键技术、场景应用和新兴业态拓展等方向展开建设,从而形成覆盖“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的专业组织体系。这种布局既有利于增加专业群与区域产业集群之间的契合度,也有利于避免载体建设中的同质化和重复化问题。

从运行方式来看,现代产业学院应坚持实体化、项目化、协同化原则。院校与企业围绕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开发、教学组织实施、评价标准建设等关键环节,开展全过程协同,将真实项目、真实任务和真实场景融入教学过程,推动学习任务与岗位任务、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有机衔接。由此,现代产业学院不仅成为专业建设的平台,也成为产教协同育人的核心枢纽。

(三)“2”:以实践中心形成技术赋能与场景支撑双平台

“2”强调围绕专业群发展需求,建设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性实践中心,以形成技术赋能与场景支撑的双平台格局。实践中心不仅是实训空间,更应是连接课程体系、技术平台、项目场景和创新服务的重要支点。

一类实践中心可主要承担数字化开发、平台应用、创新训练和教学资源转化功能,为学生提供接近产业前沿的实践环境,也为教师能力更新和教学改革提供重要支撑。另一类实践中心可侧重关键技术训练、复杂任务实践和职业能力综合提升,强化学生在准真实或真实工作情境中的问题解决能力、职业适应能力和规范意识。两类平台相互补充,共同支撑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教师专业能力提升以及实践教学改革。

从深层逻辑来看,实践中心不应停留于设备和空间层面的建设,而应成为集教学改革、技能训练、成果孵化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平台。只有当实践中心真正嵌入专业建设全过程,产教融合才能实现由“设备集聚”向“能力生成”的转变。

(四)“N”:以产业链企业网络拓展协同生态边界

“N”体现的是开放性、网络化和生态化的建设逻辑,即通过吸纳产业链上下游及创新链相关主体,构建多层次、多功能的企业合作网络,从而形成覆盖人才需求反馈、技术协同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和就业创业支持的合作生态。

在人才供需对接方面,企业网络能够动态反馈岗位结构、技能标准和用工需求,为专业调整、课程改革和培养方案优化提供外部牵引;在协同创新方面,企业网络能够将真实技术问题、应用场景和市场需求转化为教学内容和研究议题,推动院校由“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参与”;在成果转化方面,多元企业主体的参与也有助于增强技术服务和应用转化的针对性与可行性。

因此,“N”并不是简单增加企业数量,而是通过生态化组织方式,提升产教融合载体的开放性、灵活性与韧性,使其能够更好回应产业链动态调整和区域发展需求。

(五)空间重构:推动“校中园、园中校”深度融合
在“1+5+2+N”模式基础上,产教融合载体建设还应进一步延伸到空间组织形态的创新。所谓“校

中园、园中校”,本质上是推动教育空间、生产空间与创新空间的深度耦合,促使教学活动、项目实践、技术服务与社会培训在更加开放、真实和复合的系统中开展。

“校中园”强调将企业项目、产业资源和工作场景引入校园,使校园空间由单一教学空间,转向兼具学习、生产、创新和服务功能的复合空间。“园中校”则强调将课程实施、实践教学和能力培养过程,延伸至产业园区和企业现场,使学生能够在真实职业情境中完成知识学习、技能训练和身份转换。二者共同推动职业教育由模拟性实践向真实性实践转型,也使产教融合由单一合作关系走向空间、制度与功能的深层嵌入。

三、完善“五方联动”组织运行机制

实现产教融合载体建设的稳定运行和持续优化,还需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组织运行机制。考虑到产教融合实践涉及政府、院校、行业、企业与园区等多元主体,本文提出构建“五方联动”组织运行机制,从治理结构、平台运营与资源保障三个层面,提升载体运行的制度化、协同化和可持续化水平。

(一)构建分层分类的协同治理体系

多元主体参与,意味着治理模式必须由单一行政主导转向协同治理。为此,应建立“战略决策、专业统筹、具体执行”相衔接的分层治理体系。

在战略决策层面,应由多元主体共同组成协同治理机构,统筹发展规划、重大事项决策、资源配置和利益协调,确保产教融合载体建设与国家政策导向、区域产业发展和职业教育改革趋势保持一致;在专业统筹层面,可围绕人才培养、技术服务、项目管理、质量评价和标准建设等关键领域设置专门委员会,提升治理过程的专业化与精细化水平;在具体执行层面,则应依托相关平台建立日常运行组织,统筹教学实施、项目推进、师资调度、学生服务和质量监控,确保治理要求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分层分类的治理结构,有助于在保障战略一致性的同时,增强运行机制的灵活性和执行力,从而提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际效能。

(二)构建育人、创新与服务一体化的平台运营机制

产教融合载体的核心价值,在于同时实现人才培养、技术服务和社会支持等多重功能。因此,其平台运营不能停留在分散化和单一化层面,而应构建育人、创新与服务一体化的运行机制。

一方面,应推动教学空间、实训空间、创新空间和产业空间联动运行,使课程教学、项目实践、技能训练、技术服务和社会培训实现功能协同。另一方面,应增强平台的市场化运行能力,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积极拓展技术咨询、社会培训、技能评价和成果转化等业务,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收益来源和运行闭环。

这种一体化的运营机制,有助于打通教育活动与产业活动之间的边界,使得产教融合载体由单一的育人平台,升级为兼具教育属性、产业属性与服务属性的综合性平台,进而增强其持续发展能力。

(三)构建多元投入与制度协同的资源保障机制

产教融合载体的长期运行,离不开持续的资源供给和系统的制度保障。因此,应建立政府引导、院校投入、企业参与、社会支持相结合的多元投入机制,推动经费、场地、设备、师资、项目和数据等关键要素的协同配置。

与此同时,还应围绕企业导师聘任、横向项目管理、成果转化收益分配、资产管理、风险防控、质量评价和绩效考核等关键环节,完善相关制度设计,降低多元主体合作成本,稳定合作预期,提升各方持续参与的积极性。

更进一步看,政策支持也应由碎片化、阶段化激励转向系统化、组合式供给。通过统筹教育、产业、科技、人社等多个部门的政策资源,形成更具协同性与操作性的支持体系,才能为产教融合载体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基础。

四、结论

“新双高”建设背景下,产教融合载体建设已成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本文依据管理学经典平台生态系统理论,从现实问题出发,分析当前产教融合载体建设中存在的主体协同不深、资源配置不优、服务能级不高和运行机制不畅等现实困境,并提出“1+5+2+N”产教融合合作模式,以及与之配套的“五方联动”组织运行机制。

研究表明,产教融合载体建设的关键在于合作关系的结构重组和制度重塑。未来,职业教育推动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应进一步强化共同体的统领作用,提升现代产业学院的专业承载能力,增强实践中心的技术赋能功能,拓展企业网络的生态协同边界,并通过分层治理、一体化运营和制度协同,为载体运行提供稳定支撑。只有实现由资源叠加向机制耦合、由项目合作向生态协同、由单一育人向

综合服务的转变,产教融合载体才能真正成为支撑职业教育类型发展与服务区域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

参考文献:

- [1]王奕俊,张雅柔,潘昱彤.“双高计划”政策实施效果评价与优化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2026(2):113-128.
- [2]张学,蔡卫星.新双高视域下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困境、逻辑与策略[J].职教通讯,2025(11):51-60.
- [3]喻宙,刘娅,杨小琨.职业院校产教融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6(6):87-94,102.
- [4]金星霖,陈鹏.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视角下跨区域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城际协同制度研究——以苏锡常都市圈

为例[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6(6):78-86.

[5]毛文辉,李许军,朱力琼.产业学院“一平台、双主体、三融合”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以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26(5):169-172.

[6]柳伟男,陈孝群,石佳文.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J].职业教育,2025,24(15):68-72.

[7]徐钰,陈嵩.协同理论视角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实践样态、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职业教育,2025,24(33):9-16.

[8]Jacobides M. G., Cennamo C., Gawer A. Towards a Theory of Ecosystem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8, 39(8): 2255-2276.

Realistic Dilemmas, Model Innovation,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arrier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Double High” Initiative

YAO Yue-yue, GU Zhou-yi, JI Wen-wen

(Schoo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New Double High” initiative establishes “high-level institutional capacity and high-quality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s the core goal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m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arriers a pivotal issue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and practice. Although certain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building such carriers, they still face realistic dilemma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multi-stakeholder synergy, suboptimal resource allocation, limited service capacity, and obstructe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In response to the practical demands of high-quality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major bottlenecks in carrier construction. Drawing on platform ecosystem management theory, it innovatively proposes a “1+5+2+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operation model and establishes a multi-level, synergistic carrier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community leadership, industry college hosting, practice center empowerment, and enterprise network expansion”. Furthermore,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platform operation, and resource guarantee, the paper designs a “five-party linkage” organizational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The study argues that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arriers embo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organization. Their construction should adhere to systems thinking,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holistic advancement, thereby promoting vocational education’s transformation from project-based cooperation to institutionalized integration and from a singular talent cultivation function to a comprehensive functional upgrade that attaches equal importance to talent training, technical services, and social support. This approach ultimately enables a deep coupling of the education chain, talent chain, industrial chain, and innovation chain.

Key words: “New Double High”;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arriers; realistic dilemmas; model innovation; operational mechanism